政治科學論叢 / 第六十一期 / 民國 103 年 9 月 / 頁 1-40

總統選舉、國家認同與侍從主義的消失？
——2000 年後雲林縣的個案研究*

張佑宗**、盧信宏***

摘　要

臺灣在民主轉型後，侍從主義是否會消失？本文主張侍從主義在臺灣社會不會消失而是在調適。很多研究發現過去以「縣」爲單位的「派系政治」，已逐步轉型以立委選區或是鄉鎮長、縣市議員爲單位的派系政治，但沒有提出一套解釋的理論。本文從兩個方面來解釋這個變遷過程：首先，臺灣的總統選舉，有效產生全國化的政治，亦即以國、民兩黨爲主的全國性競爭體系。但是，國家認同分歧是總統選舉結果最大的解釋因素，國家認同不像盛行在歐美或拉丁美洲國家左、右兩派意識型態的分歧，無法具體落實到公共政策。因此，總統候選人在當選後，仍需以特定的資源分配模式，也就是用利益交換結合各種地方力量。侍從主義在臺灣社會並不會消失，只是比以前更「零碎化」、「個人化」與「山頭化」而已，政策綱領式的政黨體系短期內在臺灣仍無法形成。本文以雲林縣的個案作爲基礎，透過數十位地方政治菁英的深度訪談、投開票資料分析與政治酬庸等方法，論證本文的看法。

關鍵詞：侍從主義、總統選舉、國家認同、民主轉型、雲林縣

---

* DOI:10.6166/TJPS.61(1-40)。本文研究相關資料，曾獲得國科會二年計畫經費之補助（NSC 97-2410-H-102-SS2）。同時，作者非常感謝兩位審查人，提供很多寶貴的修正意見，謹此一併致謝。文中若有任何疏漏，概由作者負責。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E-mail: yutzung@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E-mail: r96322026@ntu.edu.tw。

收稿日期：101 年 11 月 21 日；通過日期：103 年 5 月 26 日

壹、導論

公民和政治人物之間的連結關係，影響政治人物是否追求全民最大福利的公共政策，或是目標團體（targeted group）的利益，還是個人的私利。理論上，Kitschelt 和 Wilkinson 把公民和政治人物之間的連結關係分成三種型態：第一種是透過政黨的政策綱領（programmatic）（廣泛的公共政策利益）來吸引選民的支持；第二種則由政黨主導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分配結構（亦即派系政治）（machine politics），對特定的個人或團體施惠以換取選票；最後一種是政黨依據政黨領袖的個人魅力（personalist-charismatic），或是宗教、族群等社會分歧，來動員各種選票（Kitschelt and Wilkinson, 2007: 19-24）。

本文主要討論第二種連結機制，尤其是侍從主義轉型（transformation）的問題。在侍從主義的分配模式下，公共政策傾向候選人個人利益的提供，這種政治人物通常不能或不願被監督，公民也不容易獲取相關的資訊。此時，如果政黨是被組織用來提供個人的回報，則政策性的承諾就變得比較不重要，而謀求最多數人福利的公共政策也會失敗。在侍從主義的政治中，勝選的政治人物將回報某些特定的個人或是團體，這些人被政黨認爲對其執政有利，將使政黨失去提供公共利益給予全體公民的動機。侍從主義將增加對政治資源尋租行爲（rent-seeking），並使政治人物趨於掠奪導向而產生腐化的現象。

過去在威權體制下，國民黨充分利用侍從主義的方式，透過層層的交換關係，以特殊利益換取選民的政治支持（Wu, 1987；陳明通，1995）。在民主轉型後，與威權體制緊密相連的侍從主義將何去何從？對於這個問題，目前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認爲臺灣的派系與侍從主義，在經濟水準、都市化與教育不斷提高下，侍從主義的社會交換網絡已無法運作，以普遍性利益爲訴求的政策黨綱式政黨將取代過去的侍從主義結構（黃德福，1994：199-220）。另一種看法卻指出，臺灣的侍從主義正在轉型，侍從主義的結構越來越不穩定，有朝向「山頭化」發展的趨勢。過去在威權時期以「縣」爲單位的「派系政治」，逐步轉型以立委選區、鄉鎮市長或

縣市議員爲單位的派系政治（王業立、蔡春木，2004；趙永茂，2002）。

本文認爲第一種看法與事實不盡相符，雖然臺灣的侍從主義建立在威權主義的基礎上，但在民主轉型後也能存活（survival），它具有韌性（resilience）與調適能力（adaption）。Kitschelt and Kselman (2013) 指出民主化的歷程與侍從主義之間存在的不是一元線性關係，而是一種駝峰型（hump-shaped）的關係。民主化初期會增加侍從主義蔓延，但隨著民主深化與鞏固，侍從主義才會慢慢衰弱。第二種觀點比較正確描述臺灣民主化後侍從主義的調適過程，但遺憾的是只具有描述性，缺乏一套深入與令人信服的理論觀點。本文指出，臺灣侍從主義的調適過程，受到總統選舉與國家認同兩種因素所影響。總統選舉牽動臺灣地方派系的發展，由於總統選舉採用簡單相對多數決，將全國整合只剩兩股政治勢力。然而，臺灣的總統選舉競爭，是建立在國家認同的分歧上。國家認同分歧並無法在選後，被具體落實在公共政策的制訂上。因此，不論任何黨派在當選後，仍需以侍從主義的資源分配模式，結合地方派系人物，以鞏固甚至擴張支持基礎。每當總統選舉時，派系便成爲總統候選人的政治包袱。但在其當選後，派系領袖又成爲重要的結盟對象，要去他們家裡做 long stay。

本文以雲林縣作爲基礎，透過數十位地方政治菁英的訪談，以及投開票資料、總統府資政與國策顧問的任命等，驗證上述的理論觀點。本文以下分爲八個部分：第一部分對侍從主義重新界定，民主化時期侍從主義的內涵，和過去威權主義時期的侍從主義並不一樣；第二部分批判過去的相關研究與理論觀點，不足以解釋民主化後臺灣侍從主義的發展；第三部分對照臺灣和拉美國家的經驗，尤其是總統選舉和政治分歧，對侍從主義發展的作用；第四部份則是本文的理論觀點，分析臺灣的侍從主義，如何受到總統選舉和國家認同分歧的衝擊；第五部分說明案例選擇的理由，雲林縣是臺灣目前少數仍有健全侍從主義結構的個案；第六部分分析由於總統選舉所產生的吸納效應，對雲林縣各種選舉的衝擊；第七部分透過政治菁英的深度訪談，分析地方派系如何回應總統選舉與國家認同的衝擊，仍能維持一定的自主性空間；最後一部分則是本文的結論。

貳、概念界定

早期的侍從主義研究，深受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影響，傾向採用 Landé 對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的定義，將侍從主義視爲一種「垂直的二元聯盟」（vertical dyadic alliance）。意謂在不對等的地位、權力或資源中的兩方，彼此找到優勢者與劣勢者結盟的有效方式（Landé, 1977: xiii-xxxvi）。臺灣對侍從主義的研究，大都沿用 Landé 的界定方式，強調面對面（face to face）的雙元關係，以及社會經濟地位上的不對等。Nai Teh Wu（吳乃德）（Wu, 1987）認爲國民黨政權以壟斷的經濟利益，吸納地方政治菁英形成選舉動員的機制，並且以司法、情治單位等國家強制力加以控制。Wu 認爲侍從主義是臺灣威權政體精心營造的利益中介（interest intermediation）與選舉動員機制。在中央強力控制與經濟壟斷的供給下，讓地方政治人物依賴個人連結的地方網絡，以壟斷政治、經濟利益分配建立起侍從體系。透過地方選舉與中央領導權力的凍結，侍從主義的制度後果是：一方面維繫中央政治菁英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幫助沒有地方基礎的外來政權，在缺乏意識型態的動員能力，以及「去動員」（demobilized）的統合結構（corporatism）下，仍然可以使用個人化的連結維繫其動員能力。[1] 由於侍從主義是以個人之間垂直性的雙元結合，這個動員方式就缺少水平的連結，導致對中央政權低度的課責效果。這個侍從主義體系最後形成以「縣」爲範圍、兩個以上主要派系輪流替換的「地方派系政治」（陳明通，1995；若林正丈，2009）。

過去建立在威權體制下的侍從主義研究，在民主轉型後，侍從主義的本質已發生重大的轉變，從兩元及不對等的社會控制關係，轉變爲「利益如何分配以爭取選票的研究」（趙永茂，2002）。趙永茂透過對於派系成員的深度訪談發現，民主化後派系相對國民黨擁有更大的自主性，得以自主決定推派人選。而國民黨則受迫於國際壓力、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與反對黨的興起等因素，越來越依賴地方派系的動員能力。以往透過「人情」

[1] 其他相關討論，可以參考以下文獻：朱雲漢（1992）；王振寰（1996）。

與「關係」爲主的動員模式，逐漸轉向以交換「經濟利益」爲主的模式。

在最新一波有關侍從主義的研究中，已從傳統二元的層級式關係，演變成志願性的交換關係（voluntarist exchange relations）（Kitschelt, 2000；Piattoni, 2001）。Hicken 歸納侍從主義四種重要的內涵：雙元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s）、可能性（contingency）、階層性（hierarchy）與反覆性（iteration）。Hicken 認爲其中「可能性」與「反覆性」，才是區辨侍從主義和其他交換關係的關鍵。在侍從關係下，雙方必須締結互惠的承諾，因此具有可能性的特質。只有滿足一方提供某項利益的同時，另一方也必須提供可信的利益來做交換，侍從關係才能建立。另外，在侍從關係中也要具備雙方彼此的信賴。雙方都會期待下次進行類似的互動，甚至建立某種社會規範以降低交易的不確定性。相反的，許多侍從主義研究者強調「面對面（face to face）的雙元關係」，或是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對等，並非關鍵的內涵。侍從者（client）的地位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佔有相對的優勢。而政治人物交易的對象，也可能是某些特定群體，未必是個人（Hicken, 2011）。

參、理論爭議

在理論上，有二個主要因素影響侍從主義的變遷，第一個是經濟發展程度，另一個就是民主經驗（Keefer, 2007；Kitschelt and Kselman, 2013；Stokes et al., 2013）。臺灣經歷快速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過程後，侍從主義將逐漸衰落或是重構？首先，從現代化理論的觀點來看，社會與經濟的快速現代化削弱了傳統二元關係（dyadic ties），促成地方派系的轉型。黃德福的研究顯示，假如以「高中以上教育人口」、「非農業就業人口」、「新生代人口」以及「人口流動率」等四個社會與經濟的現代化指標，以及民進黨得票率佔國民黨得票比率，用來代表政黨競爭程度，以這些因素觀察地方選舉，發現現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派系的影響力越低，而政黨競爭的程度幾乎沒有影響（黃德福，1994）。高永光（2000）不贊同現代化因素對侍從主義動員有負面影響的假設。高永光的研究發現，假如運用相同的現代化指標來進行檢證，臺北縣（今新北市）各地區都市化程度與動員能力

的高低，呈現出正相關。國外的發展經驗，也成爲現代化理論的反例，例如巴西和日本，雖然經過數十年經濟成長，傳統的派系政治仍然存在。[2] 事實上，在 1960 和 1970 年代的臺灣，快速的社經現代化使得地方派系有更多機會取得壟斷性的租金（monopoly rent），促使地方派系壯大。與其說是衰弱，不如說是地方派系從傳統的上下層級式的關係，演變成類似志願交換的關係。更重要的，現代化理論也無法解釋爲何發展程度較低的南臺灣（包括屏東縣、高雄縣、臺南縣），派系的瓦解會比繁榮的中臺灣（臺中縣）來的更爲明顯。[3]

其次，臺灣的民主化對威權時期所建立的侍從主義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Chin-Shou Wang（王金壽）傳承 Wu 的看法，認爲司法與情治單位的威嚇、壟斷的政治機會和經濟利益，構成侍從主義利益中介模式與派系政治的重要基礎。因此，當政治民主化後，尤其反對黨的出現、各級政治機會的開放與競爭，經濟壟斷的消失，都會讓派系政治產生巨大的變化。Wang 認爲侍從主義與地方派系組織能有效運作的關鍵，並非可分配資源的多寡，而是威權政體能以強制力（coercion）作爲分配的基礎。因此，當司法與情治機關不再提供保障，選舉越來越競爭、自由化的媒體、獨立的文官體系，以及強大的反對黨出現時，地方派系便無法在國民黨保護下繼續壟斷資源的分配，而面臨內部與外部的競爭壓力。自由競爭的選舉，使得地方政治菁英與國民黨之間，不再具有共同的利益，地方政治菁英得以尋求反對黨的支持獲得勝選；其次，當國民黨無法利用情治與司法系統掌握更多資訊，並且對侍從的地方派系進行懲罰時，侍從主義關係也變得難以維繫。而侍從主義導致的「黑金問題」，開始被反對黨營造成政治議題，在媒體自由化下使得運作侍從主義動員策略的成本不斷上升（Wang, 2004；

---

2 針對巴西與日本的分析，可參考 Hagopian (1996)；Rosenbluth and Thies (2010)。

3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家庭收支科《台灣地方家庭收支調查》，在 2010 年時台中縣每户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爲 657,468 元，遠高於台南縣的 605,940 元、高雄縣的 645,589 元與屏東縣的 616,769 元。再依據農林漁牧業就業者的比率，在 2010 年時台中縣平均爲 5.29%，遠低於台南縣的 9.28%、高雄縣的 7.62% 與屏東縣的 15.05%。這些數據在在都顯示台中縣的現代化程度遠高於臺灣南部各縣市（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家庭收支科，2014）。

王金壽，2004）。Wang 的研究資料發現，威權時代的派系與樁腳組織目前紛紛瓦解，侍從主義在自由主義式的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下，難以成爲有效的動員機制。

然而，Wang 以威權主義的式微等與民主化有關的因素，推論臺灣地方派系勢必瓦解的說法，可能忽視侍從主義與民主體制的結合，民主國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侍從主義的現象，即使是美國也不例外。威權體制強制力的式微，只能用來解釋侍從主義的解組過程，但無法說明重構的結果。王業立針對臺中縣的研究發現，民主化後紅、黑派對立情況不再像過去那麼激烈，但侍從主義以特殊利益交換與結盟的政治型態，並未發生根本的變化。只是結盟的對象變得更富彈性與複雜化，造成大型的派系逐漸分化成爲「山頭化」（王業立、蔡春木，2004）。民主化初期帶來激烈的政黨競爭，每個政黨都想贏得選戰，侍從主義仍是一種有效的動員機制，民主轉型反而強化選民和政治人物之間的侍從連結關係，尤其在缺乏政策綱領式政黨的社會（Kitschelt and Kselman, 2013）。

在民主化過程中，其制度的變革對侍從主義的影響也不可忽略。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single non-transfer vote, SNTV）被認爲有利於侍從主義，並強化黨內競爭與弱化議題投票（issue voting）。[4] 王金壽認爲 1992 年與 1998 年的中央民代改選帶來的政治機會的大幅度擴張，使得原本侷限在省議員和有限的立委、國代補選的地方政治菁英，擁有更多政治機會進入中央政治體系，並且攫取更多政治與經濟利益。然而，這樣的制度變革卻導致派系內部爲了提名候選人而產生嚴重的分裂。原本穩定的金字塔體系有賴政治權力、各項資源與名望的寡佔得以維繫，形成由少數擔任省議員、立法委員或是中央級官員的派系菁英領導派系組織。但在開放更多中央級民代員額後，立法委員全面改選與擴增的缺額遠大於既有的省議員人數，因此組織內部的其他菁英開始爭取這些政治職位，以取得更多政治、經濟資源。制度的變革破壞派系的領導組織，加上反對黨的競爭使得政治菁英有更多選擇與勝選的機會。這讓整個派系組織的「金字塔結構」無法處理越來越多元的選舉，內部菁英鬥爭與權力繼承的問題而四分五裂（王

[4] 相關討論可參考 Grofman (1999)；Bouissou (1999)。

金壽，2007）。尤其從 2008 年起，臺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採用並立式混合制，單一選區有利於國、民兩大黨的競爭，而不利於其他小黨，甚至地方派系的存在。兩黨之間的政治分歧與政策主張，比其他政治人物與選民的連結更爲重要（Lin, 2006；盛杏湲，2008）。個人化的侍從主義，將逐漸被政黨在全國建立的政治分歧所取代（蔡佳泓等，2007）。

但是，我們不能單看立委選制的變革，而忽視其他更重要的制度變遷，那就是總統直選與直轄市長的選舉。而且，過去派系運作主要的場域，例如縣市長、鄉鎮市長和縣市議員的選舉制度並未改變。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甚至鄉鎮市長選舉），才是派系形成與運作最主要的場域。第三，如果立委選制的改變能削弱地方派系，那麼臺灣各地的派系應該都會的受到影響，但臺灣不同縣市地方派系的消長情況並不一致。同樣的理由也可以質疑王金壽的論點，雖然國家強制力減弱、情報系統非政治化、司法獨立以及新聞自由的提升，但是臺灣各個地方的派系消長仍有差異，並非均勻的衰退。

對於臺灣侍從主義調適的過程，本文要提出一個全新且重要的觀察面向，分別從總統選舉和國家認同分歧的角度切入。總統選舉會造成全國化政黨體系的建立，直接造成侍從主義的消逝的結果。但是，臺灣總統選舉最大分歧因素是國家認同問題，與歐美和拉丁美洲民主發展的經濟改革議題不同，國家認同分歧並無法提供具體的公共政策，讓選民在選後對當選人進行選舉課責（electoral accountability）。當選人在連任壓力（或栽培屬意接班人）理性的考量下，必須重新建構新的侍從主義結構，才能足以動員過半的選票保證其當選。以下將比較拉美與臺灣的差異，進一步闡述總統選舉與社會分歧，如何影響台灣侍從主義的調適過程。

肆、拉美經驗的對照

「全國化的政黨體系」（nationalization of party systems）這個概念，與侍從主義的發展是一體兩面的，彼此具有相互消長的關係。Caramani 認爲「政治全國化」，代表一種朝向全國性的選民、政黨體系、政黨組織、政黨運動及政黨議題的歷史進程，從一個由地方人物主導的破碎型侍從主

義、具高度分歧的地方政治類型，轉變爲具全國性代表的政治活動或政黨競爭型態。透過全國政黨組織的發展，將地方候選人吸進全國性的政黨結構及思想體系中，讓政黨的政策綱領及公共議題成爲選舉的主軸，降低對地方性問題的爭論，使原先代表不同選區利益的候選人，在全國化政黨體系的結構下，成爲「政黨的候選人」（Caramani, 2004）。

拉丁美洲派系政治的式微，以及全國化政黨體系的發展，主要是因經濟改革所引發的社會矛盾，逐漸形成左、右兩大政黨體系。90 年代以前，大多數拉美國家都建立良好的地區性政治組織，獨立於國家領袖的控制，運用侍從網絡的關係進行選舉動員。Aleman and Kellam 認爲地方首長、州長、總督等，會抑制國家力量的強度，對政黨體系發展的影響力不容小覷（Alemán and Marisa Kella, 2008）。Jones and Mainwaring 認爲聯邦國家越傾向較低的全國化程度，聯邦制度讓各政黨在各州之間有更多的差異；愈破碎的政黨體系，越傾向愈低的全國化程度。在國家範圍內，愈大的政黨愈傾向全國化，較小的政黨則較少有全國化的傾向。在較低全國化程度的國家中，立法機關不只有較破碎的政黨，而且這些不同的政黨力量有明顯的地理差異（Jones and Mainwaring, 2003）。

在 90 年代後，當拉丁美洲國家轉向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道路後，部分國家的經濟逐漸富裕、教育水準提高，對於派系提供選擇性誘因的需求漸漸減少，使得選民對於政策綱領式的學習成爲可能。但經濟發展和選舉競爭，並非導致政治連結轉型的直接因素。經濟發展與政黨競爭形塑「政治格鬥的賭注」（stakes of political battle），而格鬥的賭注影響政策綱領式政黨體系的形成。拉丁美洲國家之所以能在 2000 年後，快速轉型成政策綱領式的政黨體系，主要與財富重分配的議題漸漸主導政黨競爭的發展有關。當選民依循這個政治賭注進行投票選擇，也逼使政治人物必須採取政黨綱領式的連結策略（Kitschelt et al., 2010）。

Hagopian 研究發現，巴西的政黨競爭在 90 年代中期之後，國會議員開始重視政黨的紀律、轉換政黨的頻率降低，並且捨棄個人特質和地方性的競選策略（parochial campaign），形成以政黨標籤和政策綱領爲主的政治競爭策略。然而，Hagopian 發現在政黨政治轉型期間，選舉制度並沒有改變，選民的政黨認同是在政黨競爭轉型後才開始形成的。巴西的案例

說明，這種轉型與經濟改革議題的兩極化（polarized）有關。經濟的衰退與市場自由化的改革，縮減國家恩惠（patronage）的範圍和資源基礎。同時，政治人物開始針對自由化議題採取不同的政策綱領，透過相互競爭決定選舉結果。由於政策位置的變動會受到選民的課責，政黨內開始變得同質化（homogenized），選民在選舉時的回應又強化這個正向的循環，進而取代侍從主義的資源分配與政治競爭模式。拉丁美洲國家的例子顯示，過去在侍從主義相關討論中，未曾受到重視的「政治分歧」，具有關鍵的影響力（Hagopian et al., 2009）。

拉美除了政治分歧外，總統選舉也是造成全國化政黨體系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總統候選人的人數越少時，總統選舉將有效降低選舉分裂（electoral fragmentation）的程度，有助於全國性政黨體系的形成。[5] Cox 認爲全國化政黨體系需經過兩個階段的塑造。首先，由不同的地理選區經地方性的整合，匯聚爲較高層級的全國性政黨。接著，經由更高層級的選舉，使政黨間發生重組，再度整合連結，形成最高層級全國性的集合。Cox 認爲當選舉進行時，候選人之間需要進行協調，或是不同的競爭者，積極尋求與區域性組織或全國性政黨的結盟。Cox 認爲地區性政黨體系形成跨區域的政治聯盟或加入全國性的政黨，與州或總統等更高層的選舉有關。這是因爲上層的選舉需要聚集基層地區的選票，這樣才能增加勝選的機會。地方性的政黨體系，會不斷經由彼此的整合與聯結，組織成爲一個全國性政黨體系（Cox, 1999）。

拉美國家政治發展的經驗，部分吻合臺灣的經驗，但也有差異之處。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行政院是最高的行政首長，但總統有直接任命行政院長權力，不需要經過國會的同意，既使總統在沒有國會多數的支持下。名義上稱爲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但總統是臺灣最重要的選舉，獲得大眾最多的關注，各政黨無不投入最大的資源競選這個職務。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the coattails effect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會讓國會議員的選舉失去其重要性。[6] 2012 年臺灣總統和立委合併選舉的過程中，媒

[5] 相關討論可參考 Golder (2006)；Hicken and Stoll (2011)。

[6] 參考 Hicken and Stoll (2011)。

體輿論的報導焦點，提升至全國性議題層次，例如國家認同（九二共識或傾中賣台）、兩岸經貿發展議題（ECFA）、貧富差距議題等。立委候選人成爲總統候選人的大樁腳，臺灣各地方派系的組織網絡，無一倖免地被捲入總統選舉的組織動員網絡中，地方派系領袖一一被政黨收編，朝向一致性政黨（homogenized party system）的方向發展，立委選舉的重要性大幅縮減。[7]

但是，如果說總統選舉的魔力，對臺灣的侍從主義具有式微的作用，國家認同的政治分歧，卻又給了侍從主義再生的機會。在民主社會中，各政黨必須在競爭過程中，有足夠的誘因取代侍從主義的分配模式與動員策略，才能有效瓦解侍從主義（Weitz-Shapiro, 2012）。然而，臺灣的國家認同分歧，並不足以完全取代侍從主義的分配模式與動員策略。總統成爲新的「恩庇者」（patron），而地方政治人物或公民成爲「侍從者」（client），兩者透過志願性的交換關係，已不是過去的二元垂直與不對等的交換關係。[8]

伍、本文的理論觀點

臺灣在經過 20 幾年民主轉型後，政治分歧建立在國家認同或族群認同的差異上。根據王甫昌（2008）的研究，臺灣族群認同分歧的形成，來自「黨外」在美麗島事件後，開始將政治目標移轉到國民黨所宣稱的國家合法性基礎，以及背後的國家民族想像，並挑戰國家定位與「本省人」及

---

7 當時反對合併選舉的意見大致可以歸類爲以下八項，分別是當選總統等待期太長恐出現憲政空窗期、若出現與現任總統不同政黨候選人當選總統將出現政爭、併選將使立委選舉淪爲配角、兩種選舉規範有差異併選會有適用的困難、應先修憲再併選且須在一定期間前公布、總統選舉提前減少首投族人數剝奪其參政權、併選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有利以及併選不合國人習慣等。立委選舉將被邊緣化，是其中一個反對合併選舉的理由，詳細資料請參見劉義周等（2013）。

8 去年（2013）發生的 9 月政爭時，陳庚金、張榮味、顏清標等地方山頭，公開力挺王金平，與國民黨中央的立場迥異，此凸顯地方派系的自主性，國民黨中央和地方派系，目前存在的是交換關係，而是志願性的交換關係，已不是過去的二元垂直與不對等的交換關係。另一個派系自主的案例就是嘉義縣的陳明文，不但公開背叛國民黨，最後甚至加入民進黨。

「外省人」之間的差異。而這個議題由於國民黨內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競爭，以及外省第二代政治菁英在選舉過程中，開始將與本省籍身分相異的「外省人」，塑造成一個弱勢群體以凝聚選票。使得族群議題在不同陣營的競爭下，成爲臺灣最爲顯著的政治分歧。在之後的實證研究中，學者們發現這個政治分歧在兩黨（或藍綠兩大陣營）競爭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統獨立場或族群認同議題，不僅成爲選舉的主軸，也成爲政黨認同的核心基礎，並且影響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政治行動。[9]

實證研究發現，族群認同分歧對政治人物發揮顯著的影響力。譬如盛杏湲對國會議員立法行爲的研究發現，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前，國民黨立委雖然佔有絕對多數，但卻各自以選區利益爲重，偏向政黨的比例相當低，國民黨只能以物質、人事利益與黨紀來勉強約束黨籍立委（盛杏湲，2000）。然而，在 2000 年首次政黨輪替之後，盛杏湲的訪談發現：以統獨議題爲核心的對立與議題競爭的極化，使得政黨標籤對立委的連任產生影響，立委願意支持政黨所提出的政策，政黨領袖因此更能約束立委，在統獨相關的政治議題上進行集體行動（盛杏湲，2008）。

選民的統獨立場、族群認同與政黨認同，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陳陸輝（2000）的研究指出，在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激烈且持續的選舉競爭，開始形塑臺灣民眾的政黨認同。他利用 1992、1995、1998 年幾次在立委選後進行的調查資料發現，不同世代選民透過不同的政治經驗，建立自己與政黨之間的連結。而這個連結基礎，正是在王甫昌的研究中，由兩黨依統獨與族群議題所建立起的政治分歧。鄭夙芬的研究，則將四次在總統選舉後進行的調查研究中「臺灣人／中國人認同」及「統獨立場」兩組問題，合併成一個名爲「臺灣意識」的單一指標。他發現，泛綠候選人的選民支持，大部分都來自具有高度臺灣意識的民眾，且有逐漸增高的傾向；而低度臺灣意識者，則顯著地支持泛藍候選人（鄭夙芬，2009）。上述這些研究顯示，以統獨與族群認同爲核心的政治分歧，是解釋政治人物與選民行爲的最主要因素。

---

9 台灣政黨認同研究的相關討論可參考：陳陸輝（2000）；蔡佳泓等（2007），以及盛杏湲、鄭夙芬（2009）。

統獨立場或族群認同，已形成臺灣政黨競爭和選民投票行爲最核心的政治分歧。但這種政治分歧是否也能如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驗，讓新的政治分歧取代侍從主義的分配與動員策略呢？我們的看法傾向否定。根據 Horowitz (1985) 的研究，在族群分歧被突顯的社會中，階級分歧很容易受到族群分歧的壓抑，甚至被族群分歧取代而消失。不過，這個說法還必須考慮到族群結構的差異。Horowitz 認爲，在不同的族群之間，族群和階級的關係會有兩種不同的組合。依照社會中的族群關係，可以區分成「等級族群體系」（ranked groups）與「非等級族群體系」（unranked groups）。區分的關鍵在於「等級族群體系」中，族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區隔，B 族群在各個領域都屈從於 A 族群之下。居於從屬地位的 B 族群領袖可能是由優勢的 A 族群領袖所挑選，甚至會發展出各種用以確認不同族群間地位差異的信仰、意識型態與利益分配模式。這樣的族群關係可能是來自於被征服的背景，譬如南非、南菲律賓與南美洲。但在「非等級族群體系」下，不同的族群之間沒有明確的上下從屬。A 群體在某一領域可能比 B 群體更爲優勢，但是 B 群體在另一領域中，可能比 A 群體具有優勢。由於 A、B 兩群體可能各有其不同的菁英，因此也會彼此競爭與流動，不會產生自我設限與強化族群分野的制度和習俗。而這類型的族群體系多是因爲他族移民，或是某一族群在特定區域中擴張而產生，譬如奈及利亞與斯里蘭卡。

Horowitz 認爲，在等級化的族群體系中，族群的分界也就幾乎等同於階級的差異，因此他們的抗爭也和階級類似，常常訴諸於社會革命的形式，對社會結構做出劇烈的挑戰與調整。相反地，在非等級性的族群體系裡，由於彼此擁有各自的菁英階級，因此族群之間的抗爭更像是「主權國家間的外交」，彼此的政治菁英都希望把對方排除在外，獨自掌握權力，而非進行激烈的社會改革以改變既有的分配體系，因此常常形成較爲保守的政治模式。

對於臺灣的族群政治，Yang 的研究指出，臺灣的族群分歧結構，應該屬於「等級族群體系（ranked ethnic system）」。國民黨屬於「征服型的移入政權」（conquering émigré regimes），不僅壓抑臺灣本土的習俗，更將大陸的文化傳統，提昇至國家文化的至高位置，並利用教育和大眾傳

播散佈這樣的等級差異，使得外省菁英凌駕於本土臺灣人之上。但是，臺灣並沒有發展成階級政治分歧的競爭。Yang 認爲，民進黨之所以沒有成爲代表階級分歧的政黨，是因爲在快速發展與流動下，臺灣的階級基礎，仍以社會地位上升中的中產階級爲主，而且也必須與具有民族意識的企業主親近。因此，民進黨策略性地選擇隱藏階級分歧，而突出族群與統獨訴求，利用極具彈性與包容力的民族「情感」，涵蓋階級政治中產生的「不平等」情感。因此，民進黨的支持者，大部分都是底層的勞動階級與小型自營業者（Yang, 2007）。

然而，Yang 對臺灣族群關係的看法，很明顯是謬誤的。在 Horowitz 的定義中，等級族群體系的要件是「一個群體在各方面都從屬於另一個群體」。但在臺灣，族群之間的權力關係卻更接近 Horowitz 例子中的馬來西亞：雙方各自在不同領域有其領導菁英存在。在政治領域，當 1987 年吳淑珍與許榮淑等人在立法院攻擊外省人在政治與專業官僚領域的絕對優勢時，也同時聲明「四十年來壟斷臺灣政治權力的統治階層，僅是外省人中的絕對少數，其他 95% 以上的外省人並未分享任何利益……」（王甫昌，2008：117）。而吳乃德（2002）的研究更指出，1994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在經濟領域中，絕大多數的本省人（含閩南與客家族群）並不認爲本省人的經濟地位比外省人差，且調查資料也顯示兩個族群之間在交友與婚姻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換言之，在當代的臺灣社會中，並沒有顯著而全面的族群間統屬關係。眞正引起爭端的，反而是政治上由於中國的威脅與中國民族認同所帶來的相互不信任，而非族群之間的隔離與壓迫。因此，臺灣的族群體系應該被歸類至「非等級族群體系」。而在此族群體系之下所衍生出的「民族認同分歧」，同樣存在於各個政治場域，並切割了其他的政治分歧。

在這種情況下，當新興的族群認同取代民主改革成爲主要的政治分歧時，就使得其他政治分歧難以出現。民進黨的動員策略，抽離階級與重分配的議題，而轉型成一個和國民黨類似的囊括性政黨（catch-all party）。[10] 這

[10] Rigger (2001) 和黃德福（1992）兩人都說明了民進黨作爲囊括性政黨的特色。黃德福傾向於認爲民進黨面臨的是政黨組織和政黨的議題策略上的困境；但 Rigger 則認爲

個結果，很明顯地凸顯非等級化的族群政治困境：由於橫跨了不同社會分歧的利益，因此也就無法完全地代表任何特定的社會利益，更缺乏具有特定立場、具可區辨特性的具體分配性政策（也就是 position issue）。在爭議的認同問題之外，只能以普遍性議題（valence issue）相互競逐選民的信任。如此，由於民族認同分歧無法產生具有區辨性的政黨綱領。並且，爲了滿足認同分歧下，各具不同利益的選民的需要，彈性地分散各種「特殊利益」來和個別選民締結交換選闢的約定，或是滿足不同需求的「侍從主義」分配模式與連結關係，就成爲政黨與政治菁英的重要動員策略。

以下將以雲林縣的派系政治發展爲例，結合質化與量化的混和方法（mixed method），以此支持驗證我們上述的理論觀點。訪談的重點放在民主化後的制度、社會、經濟變遷，以及政治分歧這幾個重要的解釋變項，對派系組織變遷與選舉動員策略的影響。

陸、案例選擇

雲林縣不論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過去或現在多少都受到地方派系的影響。因此，總統選舉和國家認同分歧，如何對存在已久的派系力量產生衝擊，是一種很好的分析個案。

雲林縣的鄉鎮級派系多源自於 1951 年地方自治開始進行農會、鄉鎮長選舉時，地方上以血緣、地緣網絡形成的爭奪情形（蘇俊豪，2004）。然而，雲林縣的全縣級派系卻一直要到 1973 年，在地人林恆生連任兩屆縣長才開始發展。在此之前，雲林縣掌握最多資源的縣長職位一直受到國民黨的完全掌控：第一、二屆縣長吳景徽雖然具有深厚的地方基礎，在擔任縣長前曾經任五年的斗六鎮長，但在第二任之後卻因爲土庫大橋弊案被判刑並從此不再留戀仕途，斷絕了原有的人脈基礎。第三、四屆縣長林金生爲嘉義新港人，曾任首屆的嘉義縣長，在連任失利後轉任雲林縣國民黨部主委，並且在任內刻意栽培後來成爲林派大老的林恒生。然而，1968

因爲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囊括性政黨，除了堅守中國統一目標外並沒有堅持的意識型態，因此迫使民進黨也必須採取全括性的政策。

年國民黨的「派系替代」策略爲了削弱地方實力，便推出了地方黨工廖禎祥參選，再度阻斷了地方派系的發展。然而，爭取提名失敗的林恒生卻在地方繼續厚植實力，不僅擔任議長也積極交往地方上重要人士。因此，在 1973 年得到國民黨提名擔任兩屆縣長後，已經和地方上重要人物發展出親近的網絡關係，如：擔任過水利會代表、縣議員，並於 1973 年起擔任省議員的黃鎮岳；1977 年受林恒生支持而當選省議員的陳錫章；培養爲接班人的農田水利會會長陳新登；縣農會總幹事鄭次雄等人（陳明通，1995）。

因此，儘管在 1981 年國民黨再次提名沒有地方勢力的黨工許文志參選來壓制林恒生，但是縣長任內累積的資源和人脈已經足以支持派系的發展，並且在之後持續和許文志縣長形成的許派、以及廖泉裕形成的廖派等等競逐縣長寶座。雲林縣派系的特色正在於沒有發展出一個穩定的全縣型地方派系，而是以掌握政經大權的縣長（林派、許派、廖派、張派）或長期的立委職位爲核心，發展出的人際與政經網絡，直到張榮味勢力的出現，才逐漸脫離多頭競爭的局面，形成以張派一派獨大的局面（田弘茂，1989）。

張榮味的勢力雖然在 1990 年代初期就以林派部分勢力爲基礎，以及水利會長張輝元的支持而形成穩固的勢力，但最後是在 1999 年底的縣長補選，突破各個派系的角逐以及國民黨徵召的縣黨部主委張正雄參選的壓力之下，以 13 萬 7 千餘票當選才開始被認爲是獨當一面、統合蘇派與原有勢力的「張派」。然而在此之前的第四屆立委選舉，張榮味即支持了原屬於許派的曾蔡美佐（1999～2005）當選。到了 2001 年，張榮味不僅在縣長選舉以 20 萬票大勝，更在立委選舉中支持了曾蔡美佐、陳劍松（水林人，親民黨籍）與高孟定（無黨籍，後來加入民進黨）當選。並且透過水利會長張輝元掌握水利會組織、妹婿張永成則爲省農會總幹事（前雲林縣農會總幹事），縣議會則有議長蘇金煌支持，同時福派與廖派式微，因此在擔任縣長之後形成一派超大的局面。

然而，2004 年卻出現重要的轉折。重回國民黨的張榮味不僅在總統大選中輔選失利，更在 8 月時雲林地檢署偵辦林內鄉焚化爐弊案，張榮味未到庭應訊，被檢查官下令拘提。但是張榮味的派系實力，仍在同年的立

委選舉中支持妹妹張麗善和水利會長的兒子當選立委，繼續維繫派系與網絡的運作。而隔年的縣長選舉，雖然同黨的許舒博參選，但張榮味卻在獄中表態「中立」，甚至暗中幫助蘇治芬（王良新，2005）。但無論如何，張派目前仍是雲林縣最大甚至獨大的派系。其上層的派系人物包括前面提到的立委、縣議會議長（蘇金煌）、水利會會長（張輝元）、前縣農會與現在的省農會總幹事張永成（張榮味妹婿）。在 2008 立委選舉，雲林縣兩位區域立委張嘉郡與張碩文都屬於派系成員，張派顯然已經全面含括了縣內所有的主要勢力。到了 2012 年，雲林縣兩席立委中，許舒博落選，張嘉郡則有驚無險順利連任立法委員。而且，張派除了繼續控制農會系統外，最近重新拿回水利會的控制權。

至於雲林縣的「黨外」勢力，可以追朔到台灣光復初期，由大陸回台發展的兩位「半山」大將，口湖鄉的李萬居，以及莿桐鄉的林頂立。儘管兩位在國民政府遷臺後，先後遭到國民黨壓制或整肅，李萬居仍在四湖地方培養蘇東啓等人進入縣議會。蘇東啓從 1953～1960 年擔任縣議員，並且在 1960 年參選縣長，以十萬多票高票敗給林金生。但是在 1961 年 9 月因爲參與「台獨叛亂」案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後未能再進入政壇，由其妻蘇洪月嬌參與地方選舉，先擔任縣議員（1964～1973），其後連任四屆省議員（1977～1993），並參選縣長（1993，落選）與立委（1995，落選）後，交棒給女兒蘇治洋與蘇治芬（陳明通，1995）。

除北港的蘇家外，在 1986 年民進黨成立之前，雲林縣地方上仍有東勢望族出身的黃麻（東勢鄉長〔1964〕、縣議員〔1955～1977〕，競選縣長〔1977、1981〕與國代〔1980、1986〕都失利），以及麥寮鄉出身的許哲男（1980 年當選增額立委）等人，但並未整合成單一的勢力，而是相互衝突的個別山頭。而且，這些勢力並未能延續到解嚴之後（蘇俊豪，2004：182）。

民進黨成立之後，在雲林縣主要的勢力有蘇氏母女、廖大林、林國華父女與林樹山等。然而，廖大林雖然當選兩屆立委（1992～1998），但在 2001 年參選失利後已淡出政壇，而林樹山在 2004 年當選立委後，並未繼續競選下一任立委。持續政治活動的就只有蘇氏家族，以及林國華與其女兒林慧如。林國華出身古坑鄉，在 1988 年因指揮「五二〇」農民大遊行

遭判刑出獄之後，連續擔任了三屆全國農權會的會長，並且在 1998 年起連續當選兩屆的立委，其女兒林慧如則擔任縣議員。在 2004 年立委選舉落選之後，林國華積極爭取同年的縣長提名，但在初選失利之後轉任農委會副主委。林慧如本人也在擔任四屆縣議員之後，回到古坑鄉擔任鄉長。

目前民進黨在雲林地方深耕的地方勢力，就剩下蘇氏一族。蘇洪月嬌長女蘇治洋在 1998 年立委選舉，以及 2002 年北港鎮長選舉失利之後，目前已經不再從事政治活動。其二女蘇治芬在 2001 年當選立委，並且 2004 年在放棄連任之後積極準備縣長選舉，終於在國民黨內派系協調失敗之後當選縣長，並在 2009 年順利連任。然而，蘇治芬在當選縣長之後，雖被認爲有意拉攏國民黨的派系組織，但在國民黨內張派的控制之下，民進黨顯然仍無法取得國民黨派系所控制的地方勢力（王良新，2005：81）。

柒、政治全國化的發展

「政治的全國化」（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是一種朝向全國性的選民、政黨體系、政黨組織、政黨運動及政黨議題制度化的歷史進程，從一個由地方仕紳主導的破碎型侍從主義、具高度分歧的地方政治類型，轉變爲具全國性代表的政治活動或政黨競爭型態。透過全國政黨組織的發展，將地方候選人吸進全國性的政黨結構及思想體系中，讓政黨的政策綱領及公共議題成爲選舉的主軸，降低對地方性問題的爭論，使原先代表不同選區利益的候選人，在全國化政黨體系的結構下成爲「政黨的候選人」（Caramani, 2004: 1-2）。而政治分歧與總統選舉，是造成全國化政黨體系兩個最重要的兩個因素。

> 「（現在政黨的）[11] 影響很大，沒有辦法不要政黨，政黨政治是一個趨勢，其他的先進國家也是這樣。……政黨剝奪了民眾選擇的權力，把持了提名權，而且政黨要求你爲了政黨來做辯護，而不是爲政策……。所以政黨政治其實是不健康的，我雖然兩個政黨都不喜歡，但是我非得找一個政黨才能夠選，不然我沒有一個通路去參

[11] 括號中的文字爲作者所加，表示在這段對話中作者提問的大致內容。

與。」（YK18）

以下分別呈現雲林縣一位由張派培養的縣議員、一位民進黨幹部，以及一位派系顧問的對話。他們顯然都體驗到制度與政黨競爭所造成的效應：

「國民黨員在單一選區下應該是不敢違紀參選，沒有機會啦。那政黨政治在臺灣已經成形了，你要沒有政黨支援，靠派系或個人要跟民進黨拼很困難。我之前聽張榮味說，他自己也不敢脫黨，只有之前縣長那次他敢而已，之後他就不敢了。一個派系要對抗政黨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們不敢，一定會聽政黨的話。」（YN10）

「以前是政黨沒那麼明顯，效應也不強，所以脫黨甚至不用黨選的，是和用政黨選的比例差不多的。所以那時候你不提名我，我可以嗆你阿！現在政黨的態勢已經很明顯，是壁壘分明，然後還有一群中間的。雖然決定誰上是中間的，但是假如政黨這塊沒有，你是絕對不會上的。所以以後差不多都要用政黨，不是藍就是綠。」（YD17）

「因爲席次越多，大家就會覺得不必太計較，你一席、我一席，政黨的意識就不高。但假如只爭一席，那麼政黨就差很多，因爲大家知道不是國民黨贏就是民進黨贏。」（YN15）

在制度誘因下，選民和政治菁英被迫朝向兩大黨移動。以下的訪談內容，來自雲林縣某個國民黨派系的核心顧問，以及一位國民黨前立委，他們在訪談中，雖然不認爲國民黨在任何方面都有影響力，或是勝過派系組織的動員，但仍然認同政黨在媒體與全國性議題中，所造成的印象會對地方選舉造成影響。而且，在兩黨對決之下，當對手以其政黨在全國形成的政策爭議加以挑戰時，他們也被迫必須回應，而受到政黨在全國所營造出的政治議題影響：

「政黨競爭在全國普遍造成的影響力，這是在上升，但不是絕對的。譬如馬團隊的執政績效假如很好，那全國對於國民黨的印象就很好。那這個因素是越來越上升的。」（YN15）

「政策當然有影響力啦，……。假如是 ECFA 這種全國的政策，

那當然也會啦，像我就在說這個政策不是不好，但在鄉下地方要找厲害的人來宣傳，大家才能夠接受。在選舉的時候，這個問題一定會被對手提到，民進黨會抓這個一直打，那我們就必須要回應，所以這就變成很有影響力的東西。」（YN15）

透過雲林縣地方菁英的訪談內容，主要凸顯兩個重點：第一，民進黨這股勢力，已經深入雲林縣的基層，並和國民黨地方派系構成三足鼎力的現狀。第二，兩黨力量能在雲林縣扎根，主要受到總統選舉和國家認同分歧的影響，後者對民進黨的助益更大。

除了使用地方菁英深度訪談外，本文另外收集 2000 年後雲林縣各種重要的選舉，分析單位包含雲林縣 387 個村里，觀察總統選舉、立委選舉與縣市長選舉，他們在得票率上的相關程度（雙變數分析）。如果相關程度越高，代表政治全國化的現象越明顯（選票不因不同候選人、不同選舉而有差異）；反之，如果相關程度越低，則代表政治全國化的現象越不明顯。過去一般認爲總統選舉受到政黨因素與全國性議題（尤其是國家認同）的影響，縣長選舉偏向地方型的選舉，立委選舉則居於兩者之間。表 1 的相關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國民黨部分，除 2000 年外，2004 年與 2008、2012 年總統選舉得票率的相關程度非常高，分別是 .951 與 .940，顯示 2004 年後總統選舉得票的分布，不受時間和候選人所影響。前一次總統選舉的結果，幾乎可以預測下一次總統選舉的結果。其次，三次總統選舉（2004、2008 與 2012 年）和兩次縣長選舉（2005 與 2009 年）之間的相關程度也越來越強。2000 年總統選舉與 2005、2009 年縣長選舉相關程度分別只有 .389 與 .387。但 2004 年總統選舉與 2005、2009 年縣長選舉相關程度提升至 .810 與 .862。2008 年總統選舉與 2009 年縣長選舉相關程度更升高至 .903。2008 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幾乎可以預測 2009 年縣長選舉的結果。在立委部分，與總統選舉、縣長選舉之間的相關程度，就沒那麼強，介於 .214 至 .698 之間。而立委選舉之間的關係，以 2008 與 2012 年這兩次立委選制改變後的相關程度最高，高達 .766。從資料中可以清楚展現國民黨在雲林縣政治全國化的現象，一致性程度呈現在總統與雲林縣長的選舉中，但立委選舉就比較不明顯。

表 1　國民黨歷屆選舉相關係數的分析

	2000年總統	2004年總統	2008年總統	2012年總統	2001年立委	2004年立委	2008年立委	2012年立委	2005年縣長
2004年總統	0.464**								
2008年總統	0.474**	0.951**							
2012年總統	0.469**	0.940**	0.974**						
2001年立委	0.384**	0.495**	0.471**	0.438**					
2004年立委	0.229**	0.499**	0.561**	0.535**	0.402**				
2008年立委	0.389**	0.691**	0.684**	0.653**	0.616**	0.408**			
2012年立委	0.396**	0.698**	0.651**	0.673**	0.554**	0.214**	0.766**		
2005年縣長	0.389**	0.810**	0.840**	0.815**	0.522**	0.568**	0.697**	0.628**	
2009年縣長	0.387**	0.862**	0.903**	0.910**	0.288**	0.529**	0.575**	0.558**	0.811**

資料來源：中選會投開票資料（雲林縣 387 個村里）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小於 0.01。

表 2 的相關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民進黨部分，2000 與 2004、2008、2012 年總統選舉得票率的相關程度非常高，分別是 .903、.908、881，顯示 2000 年後總統選舉得票的分布，不受時間和候選人所影響。前一次總統選舉的結果，幾乎可以預測下一次總統選舉的結果。其次，三次總統選舉（2004、2008 與 2012 年）和兩次縣長選舉（2005 與 2009 年）之間的相關程度也越來越強。2000 年總統選舉與 2005、2009 年縣長選舉相關程度分別是 .793 與 .774。2004 年總統選舉與 2005、2009 年縣長選舉相關程度提升至 .809 與 .862。2008 年總統選舉與 2009 年縣長選舉相關程度更升高至 .903。2008 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幾乎可以預測 2009 年縣長選舉的結果。在立委部分，與總統選舉、縣長選舉之間的相關程度，就只有六成左右，但比國民黨高很多。從資料可以清楚展現民進黨在雲林縣政治全國化的現象，總統或雲林縣長的選舉，甚至立委選舉三者之間逐漸呈現一致性。

表 2 民進黨歷屆選舉相關係數

	2000年總統	2004年總統	2008年總統	2012年總統	2001年立委	2004年立委	2008年立委	2012年立委	2005年縣長
2004年總統	0.903**								
2008年總統	0.908**	0.951**							
2012年總統	0.881**	0.941**	0.974**						
2001年立委	0.685**	0.617**	0.589**	0.570**					
2004年立委	0.691**	0.672**	0.681**	0.643**	0.638**				
2008年立委	0.643**	0.627**	0.674**	0.633**	0.508**	0.565**			
2012年立委	0.732**	0.735**	0.693**	0.716**	0.636**	0.508**	0.447**		
2005年縣長	0.793**	0.809**	0.841**	0.815**	0.635**	0.590**	0.668**	0.665**	
2009年縣長	0.774**	0.862**	0.903**	0.913**	0.517**	0.582**	0.582**	0.601**	0.809**

資料來源：中選會投開票資料（雲林縣 387 個村里）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小於 0.01。

上述投開票資料充分證明，總統、雲林縣長和立委選舉，越來越具有一致性的趨勢，選舉競爭逐漸推向政黨全國化，這是總統選舉對縣長與立委選舉的作用。過去派系運作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縣長選舉，目前在雲林縣，任何一個地方派系如果沒有國民黨的背書，想要單獨競選縣長已經不太可能。

至於雲林縣鄉鎮長選舉或是縣議員選舉，由於無法順利取得投開票資料。本文只能以無黨籍當選比率間接證明。雲林縣第 15 屆（2005 年）鄉鎮長選舉結果國民黨當選 8 個鄉鎮市長，民進黨 2 個，無黨籍 10 個。第 16 屆（2009 年）鄉鎮長選舉結果國民黨當選 2 個鄉鎮市長，民進黨 6 個，無黨籍 12 個。雲林縣第 16 屆（2005 年）縣議員選舉結果國民黨當選 18 個縣議員，民進黨 5 個，無黨籍 20 個。雲林縣第 17 屆（2009 年）縣議員選舉結果國民黨當選 13 個縣議員，民進黨 13 個，無黨籍 17 個。資料顯示不同屆之間變動的幅度非常大，而且無黨籍當選的比率最大，可以間接政治全國化的程度不高。

捌、派系對政治全國化的回應

在總統選舉導致全國化政黨體系的趨勢下，逼使臺灣的侍從主義被整合進入兩黨競爭體系中。然而，雲林縣的政治人物，並不認爲政黨標籤和全國性議題，可以完全可以取代過去的經營策略。對他們來說，最爲重要的，還是個人和派系經營的組織、樁腳和人際網絡。而在新的立委選制中，雖然選制強化兩黨競爭，但同時也強化個人的選區服務與經營，才能突破 50% 選票的關卡。譬如一位前任立委就這麼認爲：

「國民黨的部份在兩次（立委）選舉裡面，他沒有辦法讓候選人贏，北部可能有，但在濁水溪以南，政黨只是派系附加的工具而已。」（YK18）

「未來假如立委和總統選舉合在一起選，那立委選舉受到的影響會非常的大。那你說選舉制度會不會讓選舉更好選，那也不見得。因爲像高雄鳳山市，9 席議員、一個市長和一個立委的選區都一樣，但立委事沒有資源直接回饋地方，那你覺得說誰的經營會比較好做？」（YK18）

「以前全縣大範圍的，你靠理念還有，現在沒有這種的……，都要靠人跟人的關係才紮實。其他方式都會怕輸阿，不敢用。」（YN13）

對於這種情況，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民特質有重大的歧異，民進黨的選民更爲重視政黨提供的意識型態，但國民黨的選民更爲重視資源的供給與滿足：

「基本上泛綠選民是看意識形態以及民進黨的旗幟在投票，深綠選民更是明顯；泛藍選民則是候選人傾向較多，選票會跟著候選人移轉」（YK06）

「（國民黨的）一般選民可能沒有黨籍意識，可是因爲地方服務的很好、有資源提供地方選民需要的東西，所以選民很效忠。那民進黨爲什麼會崛起，因爲他們提供給選民另一個思考的面相，你不一定要選擇國民黨的候選人，你愛臺灣就投了。」（YK20）

現代化因素在雲林縣並不明顯。一位曾經負責執行操盤的無黨籍樁腳就說明，即便是在雲林縣最爲都市化的斗六市，較能夠拒絕社會人際網絡影響，和侍從主義交換的，也只有市中心的住民。當政黨在政治分歧中，缺乏明確的位置讓選民辨認時，國民黨和選民之間很難建立足以取代侍從主義的連結關係。

> 「那你說這種方式會變化，會，但速度很慢。像斗六市，市中心這些可能不必買，他們會自己判斷。但是你看比較邊陲的里，你當然要去買。所以選舉還是要看誰跑的勤，像我們在輔選，就是到處去打探說是哪一邊的人跑的比較多，這樣我才知道該怎麼補。」（YN13）

所以，制度、政黨競爭確實讓國民黨在政黨標籤、政治議題，以及政黨紀律上，對選民與政治人物產生相當的影響力。但是，在國民黨政治人物的眼中，樁腳和候選人平時努力經營，以及透過利益交換的侍從關係，仍然是選舉中最重要的策略：

> 「現在立委選舉應該可以說是僅次於總統選舉，是第二高層次的選舉。但是國民黨因素下降是說，立委選舉裡面，候選人對於樁腳和選民的情感連結，他所造成的效果還是比國民黨的影響力大。」（YN15）

> 「過去的派系影響力可能百分之百都要靠組織的力量去動員，現在可能是六、七成，只是比較弱，但還是有過半的影響力。」（YK09）

透過樁腳，國民黨政治人物在其中包裝了政黨形象與政見。但是，在訪談資料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最重要的影響力還是樁腳和選民之間的人際關係。唯有透過人與人之間緊密的人際網絡，其他的影響力才可能發揮。

> 「立委的話，中間選民、比較難左右的比較多，他會先看人、文宣，但是單純看這個的比率很低，假如有人再來拜託，樁腳有去跑了，那他才會眞的認眞看。那這樣大概就能掌握 3、4 成的票了。所以你假如樁腳不夠，那你立委會很難選。尤其是現在選區變小了，對

立委就更好跑，你一定要顧椿腳，要有人下去帶，文宣帶著去拜訪。」（YN13）

派系政治人物必須在提名，與某些政治議題上，順從政黨的要求，但並不妨礙地方派系運用侍從主義，建立起政治連結與勝選能力。當受訪者被詢問到張派目前的思維時，某位前立委就直言：

「他要的是國民黨在地方的代理權，他不管中央是誰，你到地方就是要文官下轎，其他縣市是不容易做到的。」（YK18）

這表示即便派系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已經無法脫離政黨運作，但是透過侍從主義的連結關係中，所具備的「直接關係」（direct relation），派系政治人物並不需要擔心政黨的影響。當政黨無法透過政治競爭營造足以取代的連結關係，在勝選壓力與根深蒂固的侍從主義連結下，政黨根本無法拒絕派系。

在雲林縣裡，民進黨與國民黨呈現非常不一樣的連結關係。在訪談資料中顯示，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傾向以政黨標籤和選民產生連結。民進黨的「政黨標籤」，確實在雲林縣的低度現代化下，產生顯著的影響。而這個政黨標籤的內涵，是族群認同的情感因素所建立起的「政黨認同連結」，以及廉潔、勤政、愛鄉土等「共識性議題」。

「民進黨有兩個核心價值，一個是清廉，一個是本土意識。」（YD02）

「民進黨都是用街頭運動、示威遊行或是大型演講會，這就是用理念，讓你頭腦裡面有這些觀念。尤其是臺灣現在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嘛，這很多人在關心。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選舉。」（YD16）

當政黨競爭形成一個核心主張，並且成爲吸引選民的主要連結方式時，政黨內部組織的團結、黨紀的影響力和選民對於政黨標籤的連結，會形成一個不斷強化的循環。在以下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以「本土意識」和「清廉」爲核心的政黨標籤之下，已經能夠在某個程度上定義出「政黨的共同利益」，也看到了「選民」和「黨組織內部」因政黨標籤而產生的課責。

「民進黨就是要靠他的那隻旗子，所以他們平常鬥爭，選舉的時候就沒了，他們厲害就在這邊。他們的選民比較看黨、不看人。」（YN10）

「對民進黨來說，假如這是整個政黨的共同利益那就必須要合作，不然事後會被選民和黨內檢討。」（YD11）

即便以政黨標籤和全國性政治分歧爲核心的連結，民進黨仍然必須佈建樁腳組織。這麼做的必要性，在於利用樁腳的人際關係，在較少吸收大眾傳播資訊的農村中散佈政黨理念。因此，在多數的訪談中，受訪者都認爲樁腳的核心工作是成爲理念的載體，負責幫政治人物做意識型態上宣傳，進行「政黨認同連結」中認同「情感」和共識性的「清廉」等理念的交換：

「民進黨立委是這樣，假如要選舉的話你在各個村裡都要有自己的人，這些人就是要幫忙宣傳、分宣傳單，不然你傳單不知道要分到哪裡去。假如你要去辦演講會，那他要幫你找人。所以都要有人脈阿，不然你去沒有人聽你講，他就是幫你找人出來接受理念。」（YD16）

「組織戰裡面也是這樣，因爲你不是要來賄選買票的，所以你也是回來空氣戰，用這些東西下去把你做過什麼、做的怎樣，用好的方式包裝出去。樁腳他們就是工具，這樣說比較不客氣，你要先讓他們認同、讓他們會講話」（YD22）

由於多數民進黨樁腳，倚賴對政黨核心理念與意識型態的認同，他們可以不必接受任何餽贈，甚至主動出錢、出力來幫忙。這和國民黨的派系組織中在侍從主義下「以利益交換樁腳支持」的邏輯並不相同。

「民進黨的動員基本上是靠底下的支持者主動，沒有辦法像國民黨有錢可以請車子、發便當，甚至是給鐘點費。其次，在動員的樁腳上，兩個政黨也有所不同。民進黨的樁腳出自於對黨以及候選人的「認同」，會主動幫忙；國民黨則不同，除了候選人跟樁腳交情要夠，還必須要有「樁腳禮」，另外樁腳跟候選人之間也會講條件，雙方存在交換關係」（YD07）

而且，在透過認同的「情感」與「理念」交換的政治連結下，即便樁腳受到其他人的影響，而有意左右選民的行爲，也不見得能夠撼動選民的支持。由於選民和政治人物與樁腳之間，是透過情感與理念進行「交換」與「課責」，相較於替代性較高的「特殊利益／選票」交易，選民與樁腳擁有更高的自主性：

> 「民進黨跟地方的關係不是用錢去處理的，所以就是要靠經營跟理念去得到選民的肯定。」（YD14）

> 「國民黨爲什麼派系影響力會贏過民進黨，因爲民進黨靠的就是這塊招牌。即便你不支持蘇治芬，但你的影響力有限阿，你能影響的就是幾個朋友，但大部分選民還是靠民進黨。那派系就不同，假如我是派頭說不支持你，那我影響力就至少有六、七成。所以同樣反對，結構不同，影響力就不一樣。」（YK09）

然而，「情感」與「理念」的交換，並不具備利益分配的內涵，但政治不可避免需處理公共資源分配的問題。在資源分配的層次中，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族群認同分歧下，除情感上的族群認同外，強調的是偏向共識性的「廉潔」與「勤政」。在橫跨其他分歧之下，難以產出具有立場性（position）的分配政策，就很有可能是以個別分配的「特殊利益」來進行分配。而在訪談的過程中，雖然民進黨的樁腳是在理念上和政治人物與選民連結，但他也和國民黨的樁腳一樣，扮演了特殊利益的中介角色。

下面的說法來自某鄉鎮的民進黨基層樁腳。當我向他問到立委平常和他們的互動時，他很明確的表達這位委員首要的優點：「很好的服務」。而這些服務，不僅是針對中間選民的需求，民進黨的選民也同樣希望立委來跑紅白帖、傾聽他們的需要，來顧及他們的「面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需求。爲了應付這些需求，這位立委擁有 14 位有給職的秘書，以及各個地方的樁腳。

> 「他有無形的組織阿，他服務做很好，好事、壞事（紅白帖）都一定會到，尤其他喪事跑很勤，有的會去到兩次以上，有時還會待到晚上。……他很勤快，手機沒在關的，只要有打電話給他他都一定會回。然後他又很有理念，很清廉，很多人說要送禮給他或給他秘書，他們都說絕對不能拿，大家欠他人情就一定會投給他。」（YD19）

「常常喔，有時候一個禮拜回來兩三次。但平常主要還是他秘書在做服務拉，他有十四個有給職的秘書，我們算是沒給錢的拉。」（YD19）

這個資料說明，即便是在透過情感認同而連結的民進黨選民中，也同樣需求資源分配。而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所依賴的分配模式，有很大的一部分仍然需要透過個別分配的方式來進行分配。而當這樣的分配需求與供給產生，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建立起的交換關係雖然沒有撼動更高層次的政治連結，但是也影響到了黨內的競爭。

當我向這位提問當初競選時的另一位黨內對手時，他很明確的指出，這位候選人的弱點就在於沒有回饋資源給自己的故鄉。我們可以發現，即便在政黨認同連結下，不同政黨依照政治分歧中不同的位置所建立起的政治連結，並不容易受到派系的侍從主義誘因影響。但在同一個政黨標籤之下，由於不再具有理念與情感上的區別，「共生」於情感連結之下的特殊利益分配與交換，成了左右選民與樁腳政治行動的關鍵因素：

「他在中央當官當那麼久，他有服務到、建設到地方嗎？初選那時候他的故鄉的二崙鄉長就帶人出來反他了，說他一個建設都沒做、沒有照顧地方，誰要支持你？……在提名的時候，蘇治芬就在這邊說要提名李應元，我們很不服，當場幾千個人就說你不支持他我們就要翻了，縣長也不會投給你。」（YD19）

在下列的訪談中，我們透過一位縣府主管的說法，可以看到民進黨政治人物建構樁腳組織的邏輯。這和 Landé 提出的「雙元直接關係」概念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卻又有所不同。在民進黨的樁腳佈建中，上一級樁腳與下一級樁腳之間有著明確的資源、能力的差異，然後以垂直的方式連結起來。但不同的是，民進黨的樁腳之間建立並不一定是「直接」（direct）關係，而是更多國家意識型態的影響。樁腳們是以意識型態來聯繫，因此也就可能出現了某種「共同的成員身分」，分享共同的利益，並且有更多的水平聯繫，而非侍從主義強調的「垂直連結」。

「樁腳是一個金字塔結構，就像直銷的上下線，或是會員這樣，一個人往下拉幾個，然後一直往下。在操作的時候，我們上面都會有

> 頭，然後下面再在各個村莊找幾個人，裡面會有衝的，也有士紳這樣。然後他會在下面再找種子部隊，跟他宣傳理念。然後每個人下面再找幾個人，變成耳語部隊。在下面就都是出來衝的。那這些都是一層一層的，不可以越級，立委到一個村莊不可以直接下去找下面的人，至少一定要有那個頭在場，不然他會去跟他同級的人炫耀，說我跟委員很麻吉怎樣，那就容易會出事。」（YD22）

然而，在另一面，民進黨的樁腳中也有以利益交換進行連結的樁腳。這是爲了吸取更多的選票，政治人物也必須依賴依循侍從主義邏輯的樁腳，單純依賴服務、建設或特定的特殊利益的分配建立起彼此的連結，而當資源不復存在，彼此的關係也就隨之毀滅：

> 「樁腳可以分成三種人，一種是理念型的結合，這裡有的是地方士紳，阿那個都是形象的，他不喜歡跟你衝來衝去，就是支持你。另外的是出來衝的，就是很有行動力，陪你到處拜訪、到處罵人的那種。這種理念型的不大會跑，找到的選票也是最多。第二種是利益結合的，他會跟你要服務、要建設，有餐會什麼的他就找人來插一腳。這種樁腳流動比較快，他看你不給他一次兩次就跑了。第三種是中間選民，他是看你做的好不好或是理念好不好，他再選擇支持你。」（YD22）

對於民進黨政治人物來說，佈建樁腳深入社會網絡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政黨競爭所形塑出的政黨標籤的有限性，以及選舉當中擴大政治基礎、追求勝選的誘因。選民並非全然受到政黨競爭的影響，因此當沒有政黨偏好的選民需求利益的分配，而政治人物又缺乏有效的政策作爲交換利益的替代方案時，就必須透過樁腳以及侍從主義的特殊利益交換方式，取得中間選民的支持。而尤其是在下述第三位曾任立委的受訪者的說法中可以發現，當 SMD 的選舉制度要求過半數支持時，以樁腳建構出特殊利益交換的連結對兩黨候選人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 「整個基層有政黨取向的大概是各三分之一、中間選民也三分之一，可以被影響的是中間選民。……那當然這中間有人情世故，還有金錢什麼的誘惑影響，所以得票會跑來跑去。那他們買票也是買這裡。」（YD23）

「對民進黨不利的就是過去因爲在立法院問政，因此不能常常跑回來婚喪喜慶的立法委員因此落選。」（YD14）

「小選區要改變選舉最重要的就是錢和人嘛，四成的選票下，錢多就可以找到人，錢多也可以改變人，把你椿腳挖走、叫他當閒人你就輸了。……社會裡面很執著的人是少數啦，常態是中央這塊最多，他們都是沒什麼決定的。」（YD02）

以下的訪談讓我們繼續看看另一位目前正在縣府內工作的局處首長，以及另一位前立委的看法。很明顯地，對他們來說，取得沒有政黨信念民眾信任的重要方式，就是建立政治人物和民眾之間的直接交換關係。一方面是讓他們理解民進黨有能力「做的更好」且能夠不收回饋，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傳統價值中的「人情」包袱。但無論如何，這些方式都更接近以「特殊利益交換」的方式來和選民構成連結關係，而不再是透過「理念」或是「共識性政策」來進行分配與選票的交換。

「應該是說人情啦，他比較說國民黨執政跟民進黨執政，結果民進黨的服務比較好，不是說什麼錢的往來，尤其是鄉下人很惜情。另外一種就是服務阿，譬如說他去幫你處理什麼事情，或是法律上的問題需要律師阿，他就幫你貼一下，或是勸你一下不要花大錢去打官司，這些都是人情。」（YD22）

「眞正要能拉攏選民就是要服務啦，那我的服務是眞的要幫你解決問題，不是去參加喪、喜事。那國民黨就是抓頭，一大串粽子一樣。那民進黨的困境就是這樣，只能個別服務再把口碑傳出去。所以我一直強調民進黨公職就是要強化他的法律知識，這樣服務才會很廣、實質。」（YD05）

而由於必須以特殊利益分配支持者，又必須以特殊利益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民進黨政治人物在有限的資源下，也就必須面對分配上的兩難。在以下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兩難的局面，和民進黨以「情感」爲基礎建立的「政黨認同連結」的特殊之處。儘管政黨支持者同樣需求特殊利益的供給，但在利益和認同權衡之下，支持者選擇的是情感面的認同。

而政治人物便因此具備了更多自主性，來交易特殊利益以追求勝選。

> 「所以我們挺很多民進黨的議員也很無奈，很多服務案件送上去，他認爲說這是自己人的，慢慢來沒關係。……他後來跟我解釋說，阿我就想說你是我自己的阿，自己人。所以我之後選你也是一定挺我的，你跑不掉，一定挺我的嘛，所以我幫忙他看他之後會不會挺我。」（YD17）

而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連結對比下，我們可以發現，政黨認同連結是不涉及利益交換的「情感認同／選票」交換關係。政治人物和選民的交換來自「情感」的認同，而利益分配只是因爲連結中缺乏資源分配的內涵而「共生」在連結之下。當問題涉及政黨之間的「理念」差異，情感的認同將凌駕於利益的又因之上。但在另一面，和中間選民之間的侍從主義利益交換的連結，則是同時「並存」在政黨認同連結之側，單獨地在認同連結不能及之處行使著交易選票的功能。

從訪談過程中，明顯看出地方政治人物，仍然對過去的侍從主義動員機制充滿信心。傳統上，侍從主義一直國民黨選舉動員最重要的機制之一，在 2008 年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重新獲得執政的機會後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如何？本文分析馬英九總統任命總統府資政與顧問的名單，分析臺灣的總統在當選後，究竟是採取拉攏或是消滅地方派系的策略。[12] 表 3 顯示，從馬英九總統就任後，一共任命 24 爲資政，其中有派系背景的，佔了其中的 7 位，將近三成的比率。[13] 在國策顧問方面，馬英九總統一共任命 81 位國策顧問，其中有派系背景的，佔了其中的 21 位，將近二成五的比率。[14] 這兩項政治職位的酬庸，地方派系都佔有一定的比例，充分證明是一種拉攏的策略。

---

[12] 2012 年台中縣黑派領袖陳庚金國策顧問沒有獲得續聘，批評馬英九總統過河拆橋，做得太絕，甚至嗆聲「來日方長、相堵會到」，足以證明地方派系領袖很重視這項職位的任命。

[13] 分別是柯明謀、許文政、林柏榕、饒穎奇、陳庚金、林淵源與陳田錨。

[14] 分別是陳釘雲、王玲惠、林木連、華加志、王慶豐、陳庚金、傅學鵬、李詩益、姜欽城、洪玉欽、洪俊德、陳義秋、蔡鈴蘭、范振宗、譚量吉、李總集、賴平雄、林仁德、林仙保、陳振清與陳恒盛。

表 3 資政與國策顧問背景的統計（2008-2012 年）

	國策顧問		資政	
	人數	百分比率	人數	百分比率
地方政治人物	21	25.93%	7	29.16%
學術界	13	16.05%	2	8.33%
藝文界	12	14.81%	1	4.16%
企業界	11	13.58%	2	8.33%
中央政治人物	9	11.11%	6	25.00%
公務員體系	5	6.17%	1	4.16%
公益活動	4	4.94%	1	4.16%
體育界	2	2.47%	0	0.00%
法律界	2	2.47%	0	0.00%
黨工	2	2.47%	4	16.66%
合計	81	100.00%	24	10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玖、結論

Cox 認爲地區性政黨體系形成跨區域的政治聯盟或加入全國性的政黨，與州或總統等更高層的選舉有關。這是因爲上層的選舉需要聚集基層地區的選票，這樣才能增加勝選的機會。地方性的政黨體系，會不斷經由彼此的整合與聯結，組織成爲一個全國性政黨體系（Cox, 1999）。總統選舉將各種選舉推向全國化選舉競爭的誘因，但國家認同是臺灣社會最大的政治分歧，卻給了侍從主義調適的機會。最近幾年，族群政治（或國家認同）與侍從主義的關係，在比較民主化研究中獲得重視。目前的討論偏重族群本身的特性，導致侍從主義容易依循容易辨識的族群差異，或是族群認同的明確性，導致政治菁英對同族選民的分配，克服民主政治中資訊不對等的障礙（Kitschelt and Wilkinson, 2007；Chandra, 2007）。但強調族群之間差異特質的論述，並不適切於臺灣的族群政治背景。吳乃德（2002）的研究發現，臺灣的族群政治分歧並非建立在族群間在經濟、社會，或甚

至種族的差異與分歧之上。我們無法應用國外的研究成果，以族群之間的差異特質來說明臺灣族群政治的特性，特別是難以理解國民黨的支持者多數仍然是閩南人，而民進黨內部也仍有外省籍菁英和許多外省籍支持者的政治現象。

吳乃德認爲，臺灣的族群認同衝突並非建立在社會的隔離與歧異，而是建立在對於兩岸關係與政治信任上。然而，這個政治上的信任感在切割了其他社會分歧，而無法形成實質分配政策下，也就成爲情感與信念上的支持與否的問題。因此，儘管如同王甫昌（2008）的研究所認爲的，臺灣的族群政治具有民主政治下，追求各個群體之間平等發展的政治意義。然而，當族群認同分歧妨礙其他分歧時，群體平等的理念也難以擴展到實質的政策上。甚至，由於政治人物無法取代侍從主義下既有的特殊利益分配模式，因此可能也必須延續侍從主義的政治模式。本文在雲林縣的個案研究，或許也能對目前的族群政治研究，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

如上所提到的，臺灣族群政治分歧的特殊性在於族群的認同涉及到了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國家內部的政治信任。但是，當兩岸關係在區域經貿整合下走向越來越緊密的經濟依賴時，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很可能因此逐漸和經濟與分配政策結合。在 2008 年政黨二次輪替之後，民進黨一方面針對國民黨的兩岸經貿政策進行攻擊，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視國內分配的問題。陳明通的研究就發現，民進黨在蔡英文擔任主席之後，在階級議題上的廣告與發言有極爲顯著的增加（陳明通，2012）。然而，族群認同與階級分歧之間，是否能在兩岸經濟問題之下連結，而形成一個在主要政黨間具有立場性議題（position issue）呢？而這樣的發展是否又能夠取代地方侍從主義的影響呢？這或許是在本文這個研究題目的關懷下，值得繼續關注的另一個後續問題。

附錄 A 雲林縣受訪政治菁英資料與代號對照表

訪談代號	黨籍	受訪者身分	受訪日期
YLN01	無	雲林農田水利會某單位主管	2009/05/08
YLD02	民	雲林縣立法委員（含前立委）	2009/05/08
YLN03	無	雲林地方記者	2009/08/07
YLT04	無	雲林縣立法委員（含前立委）	2009/08/23
YLD05	民	雲林縣立法委員（含前立委）	2009/08/24
YLK06	國	雲林縣立法委員（含前立委）	2009/10/06
YLD07	民	雲林縣立法委員（含前立委）	2009/10/21
YLD08	民	雲林縣縣議員（含前議員）	2010/04/20
YLK09	國	雲林縣農會幹部	2010/04/20
YLN10	無	雲林縣縣議員（含前議員）	2010/07/19
YLD11	民	雲林縣縣議員（含前議員）	2010/07/19
YLD12	民	民進黨雲林縣黨部幹部（含前黨部幹部）	2010/07/21
YLN13	無	（傾國民黨）樁腳民間某協會主席	2010/07/25
YLD14	民	雲林縣政府局處首長	2010/07/25
YLN15	無	派系顧問	2010/08/12
YLD16	民	雲林縣立法委員（含前立委）	2010/08/18
YLD17	民	民進黨雲林縣黨部幹部（含前黨部幹部）	2010/08/18
YLK18	國	雲林縣立法委員（含前立委）	2010/08/27
YLD19	民	民進黨某鄉鎮樁腳	2010/08/30
YLK20	國	國民黨雲林縣黨部主委（含前主委）	2010/09/02
YLK21	國	國民黨雲林縣黨部黨工（含前黨工）	2010/09/02
YLD22	民	雲林縣政府局處首長	2010/09/02
YLD23	民	雲林縣縣議員（含前議員）	2010/09/27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王甫昌，2008，〈族群政治議題在臺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臺灣民主季刊》，5(2): 89-140。

王良新，2005，《雲林縣地方派系之變遷》，嘉義：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爲例〉，《臺灣社會學》，7: 177-207。

王金壽，2007，〈政治市場開放與地方派系的瓦解〉，《選舉研究》，14(2): 25-51。

王振寰，1996，《誰統治臺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王業立、蔡春木，2004，〈從對立到共治：臺中縣地方派系之轉變〉，《政治科學論叢》，21: 189-216。

田弘茂，1989，《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台北：時報文化。

朱雲漢，1992，〈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蕭新煌（編），《解剖臺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前衛，頁 139-160。

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家庭收支科，2014，〈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行政院主計總處網頁，http://win.dgbas.gov.tw/fies/quick.asp，2014/05/12。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臺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臺灣社會學》，4: 75-118。

若林正丈，2009，《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新自然主義。

高永光，2000，〈城鄉差距與地方派系影響力之研究－1998 年臺北縣縣議員與鄉鎮市長選舉的個案分析〉，《選舉研究》，7(1): 53-85。

盛杏湲，2000，〈政黨或選區？立法委員的代表取向與行爲〉，《選舉研究》，7(2): 31-70。

盛杏湲，2008，〈政黨的國會領導與凝聚力－2000 年政黨輪替前後的觀察〉，《臺灣民主季刊》，5(4): 1-46。

盛杏湲、鄭夙芬，2009，〈臺灣民眾的藍綠認同與紅衫軍運動的參與：一個框架結盟的解釋〉，張福建（編），《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頁 131-181。

陳明通，1995，《地方派系與臺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

陳明通，2012，〈五都選舉與民進黨轉型－一項社會分歧動員的觀察〉，「2010

臺灣政治學年會暨『重新思考國家：五都之後，百年前夕！』學術研討會」論文（12 月 4 日至 5 日），台北：東吳大學。

陳陸輝，200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7(2): 109-141。

黃德福，1992，《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社。

黃德福，1994，〈政黨競爭與政治民主化：臺灣地區政黨體系的新挑戰〉，《選舉研究》，1(2): 199-220。

趙永茂，2002，《臺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翰蘆出版社。

劉義周、陳陸輝、黃紀，2013，〈2012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選舉過程的回顧〉，陳陸輝（編），《2012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變遷與延續》，台北：五南，頁 1-14。

蔡佳泓、徐永明、黃綉庭，2007，〈兩極化政治：解釋臺灣 2004 總統大選〉，《選舉研究》，14(1): 1-31。

鄭夙芬，2009，〈族群、認同與總統選舉投票抉擇〉，《選舉研究》，16(2): 23-49。

蘇俊豪，2004，《雲林縣地方派系變遷及其與選舉關係之研究》，桃園：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英文部分

Alemán, Eduardo and Marisa Kellam. 2008. “The Nationalization of Electoral Change in the Americas.” *Electoral Studies* 27(2): 193-212.

Bouissou, Jean-Marie. 1999. “Organizing One’s Support Base under the SNTV: The Case of Japanese Koenkai.” In *Elections in Japan, Korea,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eds. Edwin A. Winckler and Brian Woodall.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87-120.

Caramani, Daniele. 2004. *The 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Electorates and Party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ndra, Kanchan. 2007. “Counting Heads: A Theory of Voter and Elite Behaviour in Patronage-Democracies.”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eds. Herbert Kitschelt and Steven Wilkin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4-109.

Cox, Gary. 1999. “Electoral Rules and Electoral Coordin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145-161.

Golder, Matt. 2006. “Presidential Coattails and Legislative Fragm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1): 34-48.

Grofman, Bernard Norman. 1999. “Introduction.” In *Elections in Japan, Korea,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n Embedded Institution*, eds. Edwin A. Winckler and Brian Woodall,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22.

Hagopian, Frances. 1996. *Traditional Politics and Regime Change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gopian, Frances, C. Gervasoni, and J. A. Moraes. 2009. "From Patronage to Program: The Emergence of Party-Oriented Legislators in Brazi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3): 360-381.

Hicken, Allen. 2011. "Cliente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289-310.

Hicken Allen and Heather Stoll. 2011. "Presidents and Parties: How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hape Coordination in Legislative Elec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4(7): 854-883.

Horowitz, Donal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efer, Philip. 2007. "Clientelism, Credibility, and the Policy Choices of Young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4): 804-821.

Kitschelt, Herbert. 2000. "Linkages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in Democratic Poli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6-7): 845-879.

Kitschelt, Herbert and Steven Wilkinson. 2007. "Citizen-Politician Linkages: an Introduction."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s. Herbert Kitschelt and Steven Wilkin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9.

Kitschelt, Herbert, Kirk A. Hawkins, Juan Pablo Luna, Guillermo Rosas, and Elizabeth J. Zechmeister. 2010. *Latin American party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tschelt, Herbert and Daniel M. Kselman. 2013.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ocratic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Parties' Linkage Strateg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6(11): 1453-1484.

Jones, Mark P. and Scott Mainwaring. 2003. "The Nationalization of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n Empirical Measure and an Application to the Americas." *Party Politics* 9: 139-166.

Landé, Carl H. 1977. "Introduction: The Dynamic Basis of Clientelism." In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ed. S. W. Schmid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xiii-xxxvi.

Lin, Jih Wen. 2006.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Japan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7(2): 118-131.

Piattoni, Simona. 2001. "Clientelism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Simona Piatto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0.

Rigger, Shelley. 2001.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Rosenbluth, Frances McCall and Michael F. Thies. 2010. *Japan Transformed: Polit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okes, Susan, Thand Dunning, Marcelo Nazareno, and Valeria Brusco. 2013. *Brokers, Voters, and Clientelism: the Puzzle of Distributive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ng, Chin-Shou. 2004.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Breakdown of Clientelism in Taiwan, 1987-2002*.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Chapel Hill, NC.

Weitz-Shapiro, Rebecca. 2012. "What Wins Votes: Why some Politicians Opt out of Cliente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3): 568-583.

Wu, Nai The.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Yang, David D. 2007. "Classing Ethnicity: Class, Ethnicity, and the Mass Politics of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59(4): 503-538.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Clientelism in Yunlin County after 2000*

*Yu-tzung Chang*** *& Hsin-hung Lu****

Abstract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clientelism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following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ile clientelism in Taiwan will not disappear, it is facing transformative pressures. The clientelism of the authoritarian era focused around factional politics at the county level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factional politics centered on legislative districts and city or county councilors. While a nationalization of party systems has already emerged, clientelist forms of politics continue to influence Taiwan's democracy. This paper explains this process of change on two dimensions.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ave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a competitive nationalization of party systems centered on two major parties – the Kuomintang (KMT) and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However,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aside from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ientelism in Taiwan is affected by the island's political cleavages. The national identity cleavage in Taiwan is unlike the left-right ideological cleavages found in both the West and Latin America and cannot be reflected in concrete public policy. Therefore, the winning candidate for the presidency, thinking rationally, will use resource allocation

* DOI:10.6166/TJPS.61(1-40)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yutzung@ntu.edu.tw
*** Master degre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r96322026@ntu.edu.tw

and interest exchange to effectively link up with local political forces and increase his own or his party's re-election chances. Therefore, clientelism in Taiwan will not disappear. However, it will be more fragmentary and individualized that in the past. A party system centered on policy manifestos has not developed in Taiwa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ases of Yunlin County, and use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local elites to describe, analyze, and demonstrate this process of clientelist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lientelism,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ational Identity, Democratic Transition, Yunlin County